长征纪物（四则）

■章熙建

记 忆

回眸长征，史诗如歌。

在各地与长征相关的纪念馆中，马灯、担架、草鞋……一件件年代久远的长征纪念物，总令我久久驻足凝望。眼前物品静默无语，我却仿佛听到穿越时空的回响：长征，长征！

马 灯

1934年初秋，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微弱灯光从深夜亮到黎明。

这年9月中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住进了何屋东厢房。白天，他拖着未愈的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夜晚，就在马灯前伏案撰写调研报告。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上面写有赣县、于都、登贤等地敌情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全境应实行赤色戒严，确保当时仅存的战略后方万无一失。

90年前，这间9平方米小屋里的微弱灯光，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放射出了一道如阳光般明亮的光束。

时针往后拨半年。1935年3月10日深夜，黔北山村苟坝，一盏马灯像萤火虫一样沿着崎岖小路疾行。提灯的是两个月前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他虽然面容憔悴，可脚下步伐坚定有力。

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经历半年长征，红军药品、粮食如今严重匮乏；而攻入打鼓新场，或许能改善这一状况。可毛泽东却看到了潜在威胁：红军时属疲惫之师，打鼓新场城堡坚固，一旦久攻不克，敌军援军蜂拥而至，后果难测。毛泽东坚持，不能“啃硬的”。但主张“打”的意见几乎一边倒。最终，会议确定攻打计划，并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坐在宿营的农舍桌前沉思许久。当警卫员点燃马灯，他突然将烟头按灭，提灯去找周恩来。经过长谈，次日会议上，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纲，分析战局，力陈利弊，最终得出红军主力“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的新的计划。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随之恢复。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同时，敌军8个师正从各地向打鼓新场进发，企图围歼红军。

那条崎岖的乡间小路，那盏忽闪如星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纵览全局和不屈不挠的坚持。最终，红军躲过了一场堪可灭顶的劫难。

1935年10月19日拂晓，仅剩7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第一纵队，击溃尾随的敌军骑兵师后，踏着薄霜走进了陕北高原吴起镇。但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马鸿宾部骑兵，气势汹汹地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

在吴起镇微凉的夜色中，毛泽东就着马灯的微弱灯光，研究作战方案。他认为，这条“尾巴”必须斩断，否则我们睡不安稳。21日拂晓，我军在二道川塔儿湾等地发起攻击，重创敌军。

漫漫长征路上，不知曾有多少盏马灯在闪烁。它们在曲折乃至黑暗的道路中，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担 架

1934年11月，红军转移队伍中，3副担架不时在崎岖山道旁、野外宿营地相聚。王稼祥、张闻天和毛泽东低声交谈着，脸上布满忧色。

警卫战士吴吉清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记述：长征中大病初愈的毛主席，躺在担架上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步。王稼祥因战伤未愈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张闻天因昼夜行军病倒也躺上了担架。

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提供了特殊机会。

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遣40万大军布下第4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而博古和李德坚持辎重、印钞机是革命本钱，不能轻易丢弃。27日傍晚，首尾50余公里、龟速行进的红军纵队被敌军拦腰切断。

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猛地一掌击在担架上，愤慨地说：“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把坛坛罐罐都背上，队伍像蜗牛爬行，敌人正好围堵上来，这是要把红军拖向灭顶之灾的。”

王稼祥立即让警卫战士抬他赶到指挥部，与周恩来一起向博古和李德重申朱德在作战会上提出的意见：扔掉“瓶瓶罐罐”，轻装抢渡湘江！

湘江战役历时5天5夜，是长征途中一场惨烈的恶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最终3万余人渡过湘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4年12月30日夜，贵州黄平县旧州镇外的橘树林里，3副担架上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交谈，毛泽东又找刘伯承、彭德怀等军团领导谈心去了。

王稼祥曾参加过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很钦佩。此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行，比李德他们更强。

张闻天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胜利与挫折的对比中，他深切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交谈中，两人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经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两次战略调整，毛泽东在红军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干脆一鼓作气，到遵义后，请周恩来同志协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当晚，王稼祥将酝酿意见告诉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张闻天根据白天谈话的内容，起草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召开那天，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在博古和周恩来作主、副报告，张闻天和毛泽东相继发言反驳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并率先为毛泽东投出了关键一票。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途经川西天全地区，遭6架敌机轰炸。军委二局报务员雷永通小腿被弹片打穿，无法继续走路行军。毛泽东得知后，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担架拿给雷永通使用。

毛泽东的担架是用瑞金毛竹做成的，下装4条短腿，上蒙一块帆布，野外宿营时可支起来作行军床。雷永通坚持不肯接受。毛泽东严肃地说：“在你腿伤痊愈之前，就用我的担架，这是命令。”

1935年8月，中央红军从毛儿盖出发准备过草地。这时，周恩来连续高烧，多日昏迷不醒。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想方设法抬他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加入其中。大家顶风冒雨6天6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携带千余副担架。这些担架在长征途中，不仅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场所，还是政治讨论的舞台和运输物资的工具，它们如一根根无字竹简，印刻着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

地 图

1935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曲靖西山乡关下村。当日，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率侦察通讯队执行侦察任务，在距关下村七八里外的滇黔公路上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缴获20余份1∶10万的云南省地形图。

原来，国民党“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部入滇“追剿”红军，因没有云南省地图，遂派副官入滇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取图，紧急送往贵阳。孰料阴差阳错，竟给同样急需云南省地图、准备抢渡金沙江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地图被立即送到驻扎在三元宫的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喜出望外，风趣地说：“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兆头是不错啊！”

红军总司令部立即依据缴获的地图，确定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并标绘出兵分三路的行军路线，于5月3日至9日一举渡过金沙江。

关下村意外获得的这批地图，成为一根撬动历史的杠杆。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张纸质小幅“灌兴全之间路线图”，长43.5厘米，宽41.5厘米，左下角落款为“红星司令部制”，时间为“十一月廿八日”。

长征时期，红军所需的地图资料，主要靠侦察手绘和作战缴获。“灌兴全之间路线图”所标注的时间，正是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作战命令的1934年11月28日。当日，红星司令部绘制了这张直观体现灌阳、兴安、全州三县各要点之间距离和地形的地图，进一步明确渡江部署和行军路线。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5昼夜血战，突破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的企图。这份手绘地图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担负长征先遣队任务的红6军团攻占黔东南旧州古镇后，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看着图上的法文注释，找来教堂的瑞士籍牧师阿尔佛雷德·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请他帮忙翻译。

在方桌上豆大的洋烛光下，萧克指着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让薄复礼翻译成中文。之后，萧克与王震一道，把红6军团预定挺进湘西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逐一标记在地图上。

萧克后来回忆说，这张地图，在红6军团转战贵州东部和长征北上中，起到关键作用。

茫茫草地，危机四伏。担任开路先锋的英雄战士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绘制引领战友穿越沼泽、走向胜利的“导航图”。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近万人过草地。先头部队边侦察、边绘制行军路线图。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的一张“草地设营地图”，上面没有比例尺和地名标注，仅在7月5日宿营地“吉瓦沟”的旁边，标注着“自该地上走十里全是草地无术（树）林，行进队伍多带柴烧水”的提示文字。

展柜上的一段说明词令人震撼——“进入草地探路并绘制这幅地图的先锋班7名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仅一人走出了草地。”

不朽的生命之图，烙印在千山万水间，闪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

草 鞋

“苏区草鞋最耐穿哟，一双能跋万座山。我打草鞋送红军哟，红军哥哥最喜欢。千辛万苦长征路，北上抗日到延安哟……”

红军出发时，苏区人民除支援了数量巨大的稻谷、被毯、棉花等，还给红军做了20万双草鞋。

当时，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战士中，有两件服饰是规范统一的：一是红五星、红领章，二是草鞋。红军老战士李长根曾回忆道：“长征出发时，我们屁股后面一边挂着手榴弹，另一边就是草鞋。”

长征跋山涉水，草鞋磨损很快，打草鞋成为部队的紧迫任务。1934年11月14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的邓小平，在《红星报》上撰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没收土豪的滥(烂)衣裤和麻等，应注意分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

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致电红1军团，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周恩来还总结出一套办法：“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那时，一位勤务员刚学会编草鞋，但编的草鞋总是不合脚，不是肥就是瘦，行军走起远路来，脚还总被磨出血。对此，周恩来边为战士们讲解，边亲手示范，撕下几根烂布条编在草鞋沿口上，以防鞋沿磨伤脚。

红军长征穿越了华南、西南等不同气候区，他们打草鞋的材料，也由最初的稻草、黄麻转变为梭草、竹麻、布筋等。1935年7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并向北进发，气候逐渐寒冷。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发出指示：“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窝（式样另发）。”这就是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皮草鞋”。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有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红星标注的北京和于都，寓意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走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而陈列柜里的一双“绣球草鞋”，则述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军民依依惜别。岭背镇燕溪村姑娘黄春秀，把一双连夜编织的草鞋塞进红军战士谢志坚背包里。这双作为定情物的草鞋又密又厚，鞋尖上还缀着两颗红绣球，寓意两心相依，期盼未婚夫早日得胜归来。

谢志坚把“绣球草鞋”挂在腰上，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一次是抢渡金沙江时，谢志坚想起家乡，情不自禁地穿了一回。一次是强渡大渡河中，他想即便牺牲也不能跟春秀送的草鞋分开，便又一次穿上这双草鞋……1951年，谢志坚带着征战硝烟回到故乡，可他的春秀早已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穿越漫漫征途的草鞋，承载着长征的艰辛悲壮，也是红军信仰与意志的象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数天后，薛岳率部赶到皎平渡口，只在江边看到一只红军丢下的草鞋。他盯着草鞋看了很久，心头一阵战栗。在他眼中，这只草鞋已不再是一件寒碜的衣物，而是一道振聋发聩的宣言。

红军脚踏草鞋，不仅能甩掉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还终将把蒋家王朝腐朽政权甩进历史尘埃！

感 念

良师

■徐贵祥

多年前一个寒冷的上午，因为写作不顺，我放下笔，站在书房窗前向外张望。忽然，一个在寒风中独行的老人闯入我的视线。

心中一热，我赶紧跑下楼，追上老人，与他同行。

老人名叫韩瑞亭，是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那是1991年春，我即将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的韩瑞亭同志到学院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向他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被一个电话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说我当过基层主官，两次上前线，吃过苦，立过功，经历丰富，在文学创作方面很有潜力。

之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助工作，算是借调干部。

在此期间，我创作了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文友梁丰同志引荐，这篇小说引起《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视。陶主编看过作品，对梁丰说：“你问问这个徐贵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作品？”

后来，梁丰把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陶主编。不久，这篇小说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题发表。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该杂志头题发表。

1995年初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扶持青年作家，为从未出过书的青年作者出版个人作品集。得益于这个出版计划，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将结集出版。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是感激欣喜。我来自基层部队，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我的创作主要靠从军的经历和写作的经验。本以为像自己这样的“草根”作家，离出书的目标还很遥远，没想到竟能如此快速地实现梦想。

军队文艺界的韩瑞亭、朱向前和陶泰忠等都是丛书编委，他们再一次帮助了我。

编委会请韩瑞亭为《弹道无痕》写编后记。他老人家饱蘸激情，洋洋洒洒，写下《在茫茫星空中寻觅自己闪光的位置》。文中，他对我的评价是：“当过兵、打过仗，立过功……于是，就有了豪勇而艰涩的士兵生涯的种种体验，就有了那一特殊生存环境中人生意味的感觉和领悟。到军艺文学系进修两年，耳濡目染，灵犀乍通，往昔军营生活的诸多印象，便如电光石火奔凑笔端……”同时，他对我的作品是这样评价的：“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

在这篇文章里，“正面强攻”第一次出现。不知是我本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韩副社长的预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总之，这四个字，已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

2005年，我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有一次在院子里遇到韩副社长，老人家高兴地说：“祝贺你啊，‘正面强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我说：“感谢您啊，在您身边工作的十几年，是我上过的最好的大学。”

老人家笑眯眯地说：“不要骄傲哦，你还年轻，好好写！”

我重重点头。

2012年，我调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系主任，同韩副社长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回去，在院子里见到他，还是老样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慢吞吞地散步。看到他，我的心里就涌上一阵温暖，赶紧跑过去陪他聊聊天。

我经常跟他讲：“韩副社长，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我来跑腿。”

几乎每次他都是那句话：“没事，有事我找你。”

这话说了十几年了，老人家没有给我派过一次活。直到去年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一部书稿，想让我看看，提提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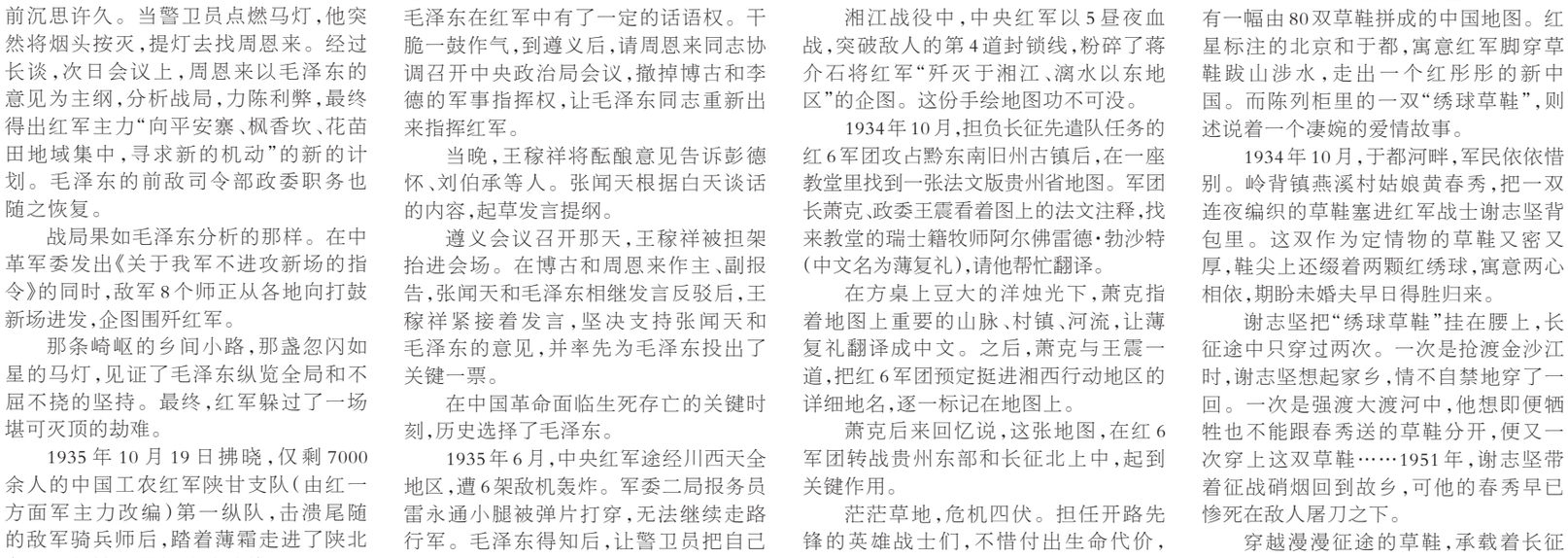
我欣然同意。

韩副社长是德高望重的评论家、散文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逻辑严谨，文学作品诗意盎然，既凝聚着他的哲理思考，也闪耀着他独特的美学见解。

后来，我把他的文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看过之后跟我讲：“难得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笔力还未减，不容易。书稿我们要了。”

鲍社长和出版社的宽厚与格局，确令人感动。

如今，听说韩副社长的作品再过一个月就要出版了，我很高兴。



万里长征图（中国画，局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徐燕孙等32人作

春天，利剑出鞘

（外一首）

■温 青

种子伸出剖开季节的一芽
生命就这样开始强大
消退的冰雪
已经掩埋在战场之下

涂在新兵脸上的迷彩
如同绿叶摇动繁花
一簇簇跳跃的火苗
随时在冷峻的枪刺上爆发
我还是那个战士
把自己的战场放在天涯
每一次冲锋
都是一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拼杀

胜利是花朵结果
牺牲是英雄回家

列队的鲜花

与散落的墓碑相望
长征路途
那一排排列队的鲜花
仿佛爬雪山过草地的人们
已经回家
看一个个
手执白菊的孩童
在画满硝烟的绘本上
找到海角天涯

那是万里长征的岁月
铺满大地的故事
已如
亿万颗种子一起发芽
花朵就这样诞生
在英雄血肉铺就的万里长路
每一步都在通向盛世繁华

鲜花的气息
是山川大地在孕育战士
以勃勃生机
排列一幅长长的长征图画
那一朵朵笑脸呵
在春风里
开成长征路上的新花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687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